

唱响“江安号子”的乡镇文化站站长

□包国平 张小波

在如皋江安，会唱一腔“江安号子”的人不少，但晓得这劳动号子荣登中央电视节目、进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人却不多。

是机缘巧合，也是老区文化氛围的滋养，更是自感身负作为一个基层镇级文化站长的使命担当，蒋晓燕，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女孩，从1996年走上文化站长的工作岗位，便开启了不懈的文化追踪。散落在民间、充满江安特色的农村劳动号子，通过她和同行者28年的关注努力，先后登上中央电视台“欢乐中国行”大舞台、第20届亚洲老将运动会开幕式表演主舞台、长三角城市非遗传统技艺展示舞台，获评如皋市原创作品一等奖、列入南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直至跻身第五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老区号子育出的文化才女

地处如皋西部革命老区的江安镇，原名“江岸”，即古代长江北岸驻地。史载：魏、晋、南北朝时，北岸线在今石庄、江安之间。旧《如皋县志》载：“正供田外，有岸亘于东西，横逾四十里，即古之江岸也。”圩田地区涨出后，原江岸不再延伸，故更名“江安”。江安，东濒黄海、南临长江，区位独特，历史文化沉积深厚，人文荟萃、民风淳朴、社会和谐、教育发达。

江安人历来崇尚文化教育，即使是赤脚巴地的农民，平时也喜欢“拽文弄词”。他们在集体劳作过程中，常常用一嘴顺溜的话，协调配合，鼓足干劲、寻求乐趣。其基本是采用“一人领唱、众人应和”的方式，以统一协调，并减轻劳动的疲劳。由于其高亢嘹亮，就被人称为“劳动号子”。千百年来，这种“劳动号子”就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代代沿袭。

蒋晓燕的姑姑很早就辍学去宣传队排戏拿工分，爸爸蒋正和也只上到初中毕业就沒学可上了。17岁那年，蒋正和就去挑

河拿工分，好在他有较好的文化功底，平时又十分喜爱民俗文化，在田埂岸边始终不忘学习，一边挑河一边写作，特别是在平整高沙的过程中写出了不少关于地方号子的文章，如《号子声的号召力》《又见县官两腿泥》等作品，分别被《新华日报》等媒体采用，最终，由一名基层农民成了新闻记者。

在这样的乡土文化和家庭氛围熏陶下，蒋晓燕对号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大场上打稻谷号子到打平田号子，从车水号子，到趟秧号子、插秧号子、施肥号子、挑担号子；从跟奶奶学，到跟妈妈一句一句地打……蒋晓燕成为打号子的内行。

基层文化站长的使命担当

1996年，伴随老区乡镇文化建设掀起的春潮，蒋晓燕考进如皋市黄市乡文化站，并担任站长一职。从走马上任伊始，蒋晓燕就开始探寻号子文化的“血脉”。她翻旧志、访老者、求专家、拜名家，终于理清了基本的发展轨迹。

千百年来，江安民间逐步形成配有民间音乐的号子。特别是近现代，很多题材反映了江安人民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后来的大生产时期的生产、生活、斗争的历史。在日常生活中，江安号子也是很好的娱乐形式，人们离不开江安号子，快乐时要唱、痛苦时要唱。

中共如皋（独立）支部1926年9月在江安镇鄂豫小学成立，江安号子中又增加了新的红色内容。在长期的工作、战斗经历中，大家往往一边干活一边不由自主地哼唱起劳动号子，又创作了大量的战斗号子。许多江安有志青年，唱着“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1927年，共产党员徐芳德等率领万余农民攻打张黄港一带的军阀孙传芳所属联军；1930年，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在江安成立，红十四军二支队和赤卫队等万余人攻打老户庄；1940年8月3日新四军抗日

挺进纵队进入如皋西乡卢港、江安地区，改称江安区。战士们在战斗过程中，创作了大量的号子，其中有《红十四军革命歌谣（暴动歌）》，抗战时期民歌《持枪曲》《抗战爱国情》等。解放后到上世纪50年代末期，江安人民在“削平高沙土，实现旱改水”的过程中又创作了红色搬运号子、工程号子、农事号子、海棠花号子等一系列劳动生产型号号子；还在平时大量的劳动生活中创作了车水号子、黄秧号子、施肥号子、送粮号子等，为大生产运动助力。

进入新时代，虽然农民的体力劳动逐步被机械化替代，号子逐渐被淡忘，但是江安镇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江安号子这一传统文化的保护，以江安镇文化站为保护主体，收集各类号子，保存推广。

走村串户，蒋晓燕了解到，仅江安镇，会唱江安号子的歌手数不胜数，能唱百首以上者也并不罕见，传承“江安号子”的队伍有8支，歌手达到100多位。他们有的是民间乐队的骨干，有的是曾经的专业演员，有的是群众文化工作者，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农民。

2005年，黄市乡合并到江安镇，蒋晓燕继续担任文化站站长。辖区变大了，时刻深感责任重大的蒋晓燕意识到，要干好新时期的文化工作，仅靠文化站站长一个人不行，必须培养发展团队。她收集整理号子歌词谱曲，又与宣传委员张跃坤和老站长庄宏祥一起，请老艺人金美兰唱，讲解号召和朱礼正老师帮写成曲子，又请出南通社区演出队赵明兰、葛美凤、丁邦芳、丁荣华和张秀英等文艺骨干，一有时间就排节目、谈发展，一起探讨新时代江安号子的传承。

江安号子依然不断创新改进

“今日车水车得硬，主家承认四碗羞，一碗豆腐一碗粉，一碗韭菜炒面筋。”听着雄浑厚重、野性十足的“车水号子”，熟悉过

去江安农村生活的人们眼前就会出现这样的一幅画面：蓝天白云下，秧苗青青，一排排桑木水车上，一群男女劳力正卷起裤腿，挽着衣袖，愉快地伏在杠上踏车车水。

“你不来呀让我来呀（咳衣呀喂），姜太公独坐钓鱼台呀（呀号哇来）（咳子喂呀嗨乎），姜太公独坐钓鱼台呀（呀号哇来）。”这样的“挑担号子”，虽编曲带有较多的即兴性，但朴实、动听，唱起来十分带劲，节奏与挑担的脚步相吻合，旋律随着感情的发展而起伏，很能鼓起劳动者的劲头。

50多年来，特别是在担任文化站站长28年的文化生涯里，蒋晓燕与“江安号子”结下了不解之缘，也赢得满满的收获。

创新完善后的“江安号子”，语言形象生动、情趣活泼盎然，其曲调高亢激奋、节奏沉稳有力、调式调性变化频繁。一领众或众人齐唱，形式变化丰富。在节奏较缓的劳动中唱的号子，“领”句较长，“合”句较短；而在较为紧张的劳动中唱的号子，领句、合句都十分短促。这种劳动号子虽然也有曲调，但主要还是强调节奏，以便人们在同一的有规则的节奏中进行劳作。人们在紧张的劳作和沉重的负荷中，吼出节奏、吼出力量，吼出气魄，彰显了劳动号子歌唱时那种吆喝呐喊的鲜明特点，表达了人类战胜困难的愿望，边干边唱，增强了劳动者的信心。

2008年，“江安号子”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欢乐中国行”文艺演出；2014年，“江安号子”被南通市人民政府评为南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5年，“江安号子”获得了如皋市原创舞台优秀作品一等奖，江安镇文化站被授予“如皋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安号子传承基地”称号；2016年，“江安号子”参加长三角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展示；2017年，“江安号子”参加第20届亚洲老将运动会主舞台开幕式表演；2023年，“江安号子”被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评为省第五批非遗项目之一。



村里有位李木匠

□阿虎

李木匠今年七十二岁，如东县石甸人。个子不高，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满面皱纹。他20岁学木匠，做了四十多年乡村木工活计。实行家庭联产承包那一年，他入赘林梓梓庄，成了农家的上门女婿。

拜师学艺三年整，酸苦多多。那时买不起自行车，披星戴月全靠步行，一走几十里吃百家饭，动筷在人后、放碗在人前。每天收作时，都要用麻袋片包好各种锯子，松开刨子刀舌和锯绳，将大小刨子、墨斗放在锯绳中间再绞紧，这样背在肩上就不会脱落了。那时没有工具箱，就用斧子柄扛着沉甸甸的工具，紧追慢赶师兄弟的脚步。名为学木匠，稍有懈怠，师傅打骂是常事。平时全靠眼明手快、头脑活泛，拉大锯、研粗料、打下手，爬高下低架梁、竖柱、铺椽子，卖力干活不多嘴，好不容易出师后，跟着师傅上门，建房上梁刻椽条，钉椽子、安楔木、做门窗、锯大料、凿榫眼，墨斗弹线、角尺描样，又当了三年“二勒头”的娘样师傅。

李木匠有些名气后，渐渐自立门户，活计多了，生意好起来。棟树槐木、桑柏柞木、杉木方料，样样在行；细料活计拿得出手，圆料木作也漂亮。那年月乡镇婚嫁，时兴置办五斗橱、挂衣柜、新式高低床、九料对拐八仙桌、床头柜等等，以及条凳桌椅、面盆架、贮粮木柜和风箱，还讲究老虎脚、香草纹、芝麻秆儿的腿形，那都是榫卯结构，严丝合缝不用钉子的，都是传统手艺呀。可是，农户请木匠上门，少则三五天、多至半个月，往往都是开工容易收工难，哪怕太阳落山、月亮升起，算计的主家还会多加一些小修理活儿，如爬儿凳缺了一条腿啦、扁担毛糙要刨光加工啦，再不济也会要求搭个鸡窝、羊舍棚子什么的，不弄到看不见鸭子生蛋吃不上晚饭。

年近不惑时，李师傅也与时俱进，添置了各种新式玩意儿。但农家请木匠上门干活的情况越来越少，李师傅曾到徒弟办的家具厂当过小领班，也为城镇居民街上人家装潢吊顶，做过玄关、隔断、博古架和屏风。五十多岁时，跟着包工头去外面工地立木模，被欠薪三万，幸亏得到法律援助，免费打官司，拖了八年，才由执行庭不断追讨，拿到血汗钱。

时尚的生活理念，越来越多的工业化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改变了家具行业，谁家还留恋那些费工费料的粗重老式木器用品呢？李木匠就歇作了。家中两亩半农田转租给农场大户，留下了门前八分地种、栽、种长些蔬菜，竹园里养着鸡鸭鹅，屋后还有一个小鱼塘。老李师傅如今忙忙田，闲来爱下象棋、玩手机，无聊的时候，还喜欢哼唱自己改词的老歌；村里有个木匠叫晓光……有时他望着那些积灰蒙尘的木匠工具，回想自己的黄金年代，心头泛起一丝淡淡的惆怅。

吆麻雀

□周素华

小区生态环境好，樟树成林，既有窗前“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的小幸福，亦有与一群雀儿相处的小烦恼。一年四季，阳台的晒衣架和地砖上总有雀儿留下一坨坨灰褐色的排泄物，叫人不胜其烦。

本着慈悲之心，在晒衣架两头各系一个红塑料袋让风吹得猎猎起舞，挂两张明晃晃的废旧光盘，制造响声、反射阳光，心里暗暗祈祷，希望能就此把这令人讨厌的雀儿赶走。

头两天，还真没有再见到鸟粪，以为难以解决的问题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谁知道，到了第三天，雀儿依旧翘着尾巴，在阳台“咕咕”叫着腾挪跳跃，时而飞走、时而回来，让人生出无可奈何的沮丧。有时吆着赶着，都觉得恍惚，仿佛回到了那个整日吆麻雀的孩提时光。

端午的粽子才吃了一口，麦收时节紧跟着来了。天空飘着几缕淡淡的白云，炽烈的太阳炙烤大地，流金的麦浪把天空也染成了黄色。麦田里，几个稻草人戴着破草帽、披着旧衣衫，手里举根长竹竿，竹竿上系着鲜艳的五彩布条，不分白天黑夜地站岗放哨，像模像样地吆着雀儿。

晨曦微露，几十只麻雀就站在麦田边的樟树上呼朋唤友，聒噪得一刻也消停不下来。馋嘴的麻雀认定成熟的麦穗也有自己的一份，还没等人去收割，就想捷足先登尝个新鲜。它们先是绕着稻草人飞来飞去，没两天，就破解了人类的小伎俩，当着人的面，毫无顾忌地立在饱满的麦穗上大快朵颐，享受着偷嘴的快乐。

眼看到手的粮食被麻雀抢夺，大人心疼了，纷纷回家差孩子上阵去吆麻雀。只要不割猪草和做家务，孩子当然乐意在外面撒野疯玩，找个破脸盆，扛根细长竹竿往麦田冲。那个年代，麻雀被宣布同苍蝇蚊子一样属于祸国殃民的四害之一，骂得打得，还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打麻雀运动”。

到了田头，我和弟弟一个敲盆吆、一个拿竹子赶，把麻雀惊得纷纷四下逃散。没过多久，估计领头的雀儿一瞧，这不过是黔驴之技，没什么可怕的，于是召唤着其他雀儿集体飞到樟树上，叽叽喳喳商量过什么之后，三三两两地飞回来，然后一哄而下，全都飞进田里。任你再大呼小叫，它们不予理睬，只顾埋头大吃特吃，一副贪得无厌的样子。我们心疼极了，气急败坏地将手中的“武器”掷过去，麻雀们“呼”一声飞到田的东头，黑压压一片，狠狠地啄麦粒。等我们追过去，它们又“呼”一下，飞向西头。东追西赶，我们跑得头顶直冒青烟，“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如此三番五次，我们累坏了，一屁股坐在田埂上生闷气，汗从头发里沿着脸颊往下流，脖子黏糊糊的，汗水和内心的沮丧搅拌在一起。精明的麻雀知道我们它们没办法，吃饱了，竟然厚颜无耻地站在稻草人的胳膊上“叽叽喳喳”闲话家常；瞪着灵活的小圆眼，挑衅地围着我们上窜下跳，甩下几句嘲笑的鸟语，翩然而去。

头两天，累得精疲力竭的我们无奈地守着麦田，徒劳地追趕着麻雀。本来肚皮就填不饱，麻雀们还呼来附近的同伴展开进攻，猖狂地张着小嘴和人类争口粮，我们彻底被激怒了。于是，我们与麻雀成了敌人。

对付敌人，我们总是有办法的。再被大人派去吆麻雀时，口袋里已经多了一把Y形弹弓，捡来石子做子弹，拉紧皮筋，侧着头，闭上一只眼睛瞄准，手一松，子弹在空中划过一道简单而优美的弧线，便如雨点射向麻雀，“嘭嘭嘭”一阵声响，积攒了满肚子的仇恨在弹弓的威力下全部释放出来，一只只麻雀挣扎着从半空中掉下来。夕阳西下，手中的网兜已有十来只伤痕累累的麻雀。油炸麻雀的奇香随晚饭的炊烟袅袅升起，小黄狗使劲摇着尾巴在小主人腿边绕来绕去，撵不走。接连打了几天，麻雀虽然照旧飞来，明显不如先前那般嚣张了，毕竟它们还是忌惮我们手中的弹弓啊。

如今，麻雀早已“平反”。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们环保意识的加强，城市、乡村雀儿的品种、数量明显多了起来。雀儿也不怕人，它们迎着朝霞飞，伴着夕阳归，它们在你身前身后跳来跳去觅食，灵活活动，自在欢快。

大自然自有它的法则。我在鸟雀的鸣唱和烦恼之间寻找生命的支点。太阳升起来了，雀儿在金灿灿的阳光下翩翩起舞、自在啼鸣，世界如此美好。



棉花朵朵

□谢志军

凌晨，窗外的风一阵紧似一阵，“呼呼”声掺杂着雨的潮气，也像冬天匆忙赶来时发出的声声喘息。天，真要冷了。

我把被子往身子底下掖了掖，琢磨着是时候把那条厚被拿出来盖了。厚被十二斤重，长两米二、宽两米，原先为两条六斤重的被子，那是结婚时母亲为我准备的。那时的床没现在大，那时的被也没现在大，那时的人在寒冷的冬天大多盖两条被子。

后来，妻子说：“你个高腿长，被子大点，盖在身上才舒服。”于是，她把这两条被子加工成现在的一条大厚被。我喜欢这条厚被，它留存着新婚的缠绵，也留存着母亲的心思。那丝丝缕缕，是母亲当年一朵棉花、一朵棉花精挑细选的。

原先那两条被子，是祖母和母亲在一个晴朗冬日的午后，一针一线用心缝起来的。

那天是个好日子，婆媳俩一边缝一边说着吉祥话：“新被上床，龙凤呈祥，早生贵子，金玉满堂。”

棉花是母亲种的，长在村子东南角的那块八分地里。那是一片淳朴厚实的土地。长棉花，不容易，其间吃过苦、流过汗的，好比一位母亲将呱呱坠地的婴儿拉扯成人高马大的青年。

三月底四月初，乍暖还寒，一粒粒饱满的棉花种子住进圆柱形的营养钵，一个个营养钵又住进竹条搭建成的大棚。白天，掀开大棚透透气；晚上，将大棚遮得严严实实。如同年轻的母亲夜间不时查看身边的婴儿，冒汗了，将被角掀一掀；蹬被了，将被子拉一拉。

育苗期间，母亲不仅关心棉花出苗，还要忙着平整一块土地——那是幼棉未来的家园。经历一个冬季的天寒地冻，碎土并不轻松，坚硬的钉耙磕着同样坚硬的泥土，需要的不仅是力气，还有巧劲：挥起、

抡下，扒地，阳光下钉耙在空中形成一道道明亮弧线，伴随着母亲的汗水与喘息。泥土碎到细无坷垃，开始筑垄。筑垄的过程又是细活：陇上的泥土需要上虚下实，垄与垄之间要抽出一条狭长的墒沟。垄筑成了，墒沟抽好了。一眼望去，道道棉垄像笔直的赛道，同样笔直的还有那条条墒沟。如果说，棉垄是棉花的宅基地，那墒沟，就是它赖以生存的河流，是棉花的生命之河。

谷雨要到了，大棚里的棉苗已长出三四片叶子，个子也有十几厘米高，到了棉苗移栽的时候。移苗期间，母亲非常忙碌，吃完早饭，带上午饭去棉田，天黑了才回家。先要在棉垄上挖洞，一个个纵横整齐、档距适中，母亲轻轻地捧着营养钵，一个个放进洞，幼棉也像鸟儿一样有了自己的窝。

五月阳光煦暖，催促着万物生长，棉花也在这灿烂季节迎来了天真烂漫的童年。大自然似乎特别眷顾这幼小的生命，晴好天气让它生活得惬意舒适。母亲却不闲着，除草、施肥、治虫，本不轻松的劳作，还被局限在小小空间，更需要加倍小心。如果哪一天不小心碰折了一棵幼棉，我能从母亲晚饭时的言语，感觉到一种轻微的疼。

转眼六七月到了，天气开始变得不听话，先是梅雨绵绵，而后常有倾盆大雨。遇上夜间大雨，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时，勤劳的人们会早早出现在棉田。他们或挖开墒沟排水，或清理墒沟杂物，或小心翼翼地扶直倒下的棉枝；如果靠近一点，也许还会听见他们轻轻叹息。但是，这叹息好似夏天的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因为夏日的棉田到处散发着勃勃生机。且让我宕开一笔，先放下眼前如少年般疯长的棉花，去看一看它生长在同一土地的生命。这时，匍匐在这块地的，可能有青黑色的香瓜、肉白色的菜瓜、圆滚滚的西瓜……田头田脚，可

能还有竖起的五颜六色的花架：豇豆花、黄瓜花、丝瓜花……迎风摇曳，多姿多彩。母亲总会把点滴土地侍弄好，从不让哪里空着，这也是那代人对待土地的珍惜与恭敬。

秋天来了，棉花也到了收获季节。每年这个时候，我喜欢到棉田里走走，那里有自然与人合作的美丽图画：朵朵棉花绽放枝头，洁白如玉、轻盈婀娜，风吹过时，如一朵白云亲吻另一朵白云、一张笑脸靠近另一张笑脸。是的，笑脸，丰收的季节，遇见的不都是忙碌的笑脸吗？这时候，只要晴天，棉田里总能见到女人摘棉花的身影，她们大多微笑着，手指娴熟地从这个枝头到那个枝头，仿佛在弹奏那首叫《丰收歌》的曲子。当然，这时候，如果碰上连绵阴雨，她们的脸也会阴着，那些烂掉的棉花果，那些即便没烂掉开出来的花也呈暗黄色的棉花果，折磨着母亲和乡亲们，那是一种庄稼人的痛。

摘下棉花，摊在芦苇席上晒干，装进干净的蛇皮袋，接下来要去卖了。棉花收购站在王庄桥口，离家四五里地。卖棉花，母亲很少单独行动，同去的往往还有几个一样能说会道的妇女。那个年代，卖棉花、交公粮都要面对收购员挑剔的眼光。棉花有等级、干湿之分，卖棉花需要几分机智，有时甚至“斗智斗勇”。我一直认为，庄稼人的淳朴与狡黠、委屈与无奈，卖棉花时表现得最为充分。我把这些时代的印记，连同公粮都要面对收购员挑剔的眼光。

我已记不清，母亲最后一次种棉花是哪年，估摸着已过去了近三十年吧。但在今晨，听窗外秋风秋雨，朵朵棉花又在我心头绽放。前不久，母亲说：“老家还有两条留下的棉花胎，新的，没用过，留给孙子结婚。”我听罢不免感叹：母亲真是情意“棉棉”、瓜瓞“棉棉”啊！